

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典型案例分析

王文龙¹

【摘要】：长期的城乡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导致内地乡村空心化严重，老人农业蔓延，无力承担乡村振兴重任，只有积极引导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本文以湖州休闲养老产业三个典型案例为样本对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城乡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正确发挥政府与市场在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将发展红利在下乡生产要素所有者与村民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积极促进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深度融合，才能有效实现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目标。

【关键词】：城市生产要素下乡 乡村振兴 实现机制 湖州 休闲养老产业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19)-01-0082(06)

二元户籍体制的长期存在，城乡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的持续扩大且固化，导致中国大部分乡村生产要素长期单向流出，空心化严重，老人农业蔓延，缺乏内生发展能力。只有积极引导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才能有效弥补乡村发展的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但如何才能实现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资源的有效结合，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正是基于此认识，中央政府在 21 世纪初实施了新农村建设战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村社会稳定。但随着各项支农政策效果递减，政府农业转移支付能力接近天花板，农产品价格增长受到世贸组织条约和国际市场竞争制约，新农村建设动力逐渐衰竭。而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的继续扩大，乡村学校的撤并，基层医疗体系的瓦解，乡村治理的悬浮化，乡村环境的恶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加速逃离农村，加剧了乡村空心化与老人农业问题，并形成恶性循环。正是认识到新农村建设动力衰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希望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提高农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有效缩小城乡综合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但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虽然减轻了乡村贫困，但对乡村振兴效果有限。由于财政压力、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与农产品种植结构调整，政府取消了部分农产品的保护价，导致农业收入下降。价格下降加上气候异常又导致 2018 年夏粮大幅减产。而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与中美贸易战的开启，实体经济的困顿也导致农民工工资增速趋缓。房价与房租的暴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也使农民工城市化阻力增大，半城市化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要继续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仅仅依靠空心化的乡村内生发展很不现实，而中央政府由于财力限制，必须引进外部城市生产要素才能有效弥补乡村振兴资源的不足，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首先，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长期存在且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导致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使乡村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传统劳动密集型小农经济衰落，老人农业蔓延，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乡村剩余劳动力或年龄过大，或身体素质较差，或头脑不太灵活，除少部分立足乡村的专业种养大户和非农就业农民外，其他的绝大部分即使

¹作者简介：王文龙，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湖州 313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与模式研究”（18BJY115）。

在乡村也属于生产力较低的群体。这个群体维持传统农业都勉为其难，更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人力资本支持。因此，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内部六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就必须从城市引进大批懂技术、懂管理、懂营销的高素质人才，使这些目标落到实处。其次，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急需的资本支持。长期的城乡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导致乡村资本匮乏，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组建农产品加工厂，研发农业技术，培训职业农民，进行六次产业综合开发。城市民间资本充裕，缺乏投资渠道，如果合理引导他们下乡投资，就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再次，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为乡村发展提供科技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大批高素质的城市下乡人才，各种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农产品加工技术，农业生产资料都是现代科技的载体，他们将现代科技源源不断地扩散到乡村，促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最后，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思想观念支持。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长期的熟人社会，小农经济导致农民普遍小富即安，思想保守，观念落后，阻碍了乡村现代化。大量高素质的城市人才涌入乡村，带来城市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公德意识、生态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契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使农民思想观念不断现代化。

然而，由于对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缺乏有效监督，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绩压力，工商资本的寻租冲动，导致国内城市生产要素无序下乡，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反应比较大的主要有三点：一是部分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利用，影响国家粮食安全。^[1]二是政府强制推动的耕地整体流转可能阻断农民工退路，不利于社会稳定。^[2]三是强势资本与基层政府、地方黑恶势力合谋套取政府农业补贴，损害农民权益，并对专业农民形成挤出效应。^[3]应该说，当前中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存在。政府的耕地保护制度非常严厉，耕地的非农化主要责任在于监管不严。一般来说，主粮种植家庭农场最有效率，近几年下乡资本纷纷撤出主粮种植就是明证，下乡资本进入主粮种植只能是短期行为，要么认识不足，要么是政府补贴的扭曲导致。耕地非粮利用部分是对僵化的土地利用制度的市场纠正，符合比较优势。由于设施农业投资比较大，技术、管理要求比较高，下乡资本具有优势，涉及较多，但非粮市场容量有限，近几年已趋于饱和，部分产品过剩严重，使耕地非粮利用动力衰减。并且，中国并不缺乏耕地，在部分耕地非粮利用、大约16%的耕地被抛荒和弃耕的情况下，中国主粮不仅供应充足而且过剩。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耕地不足，而在于耕地缺乏整理，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水利荒废，粮食价格过低，导致大量耕地不能利用或低效利用，这些恰恰需要引进下乡资本予以解决。至于认为土地流转会阻断农民工退路，影响社会稳定的看法也脱离实际，农民也是理性的，不会轻易把耕地流转。农二代、农三代对务农基本缺乏兴趣，他们大部分宁可漂在城市也不愿意回乡务农，并且就那几亩地收入不要说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要维护乡村稳定，政府应该一方面为农二代城市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这才是可行方案。强迫农民耕地流转主要是政府为政绩工程不当干预造成，只要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尊重市场选择，这些问题就能化解。至于下乡资本对农民的挤出效应就更不存在，这是市场竞争行为，租金从无偿用地农民手中转到出租土地农民手里，淘汰掉低效的农业生产者，使生产要素集中到高效生产者手中，被挤出的农民可以到更有效率的产业寻找新工作，属于帕累托改进。因此，当前学者们将城市生产要素无序下乡的板子全部打在下乡资本屁股上很不合适，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民缺乏保障问题，农民利益受损问题主要与政府监管不严，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陈旧的维稳思维有关，与下乡资本本身关系不大。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障碍，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对下乡资本的监管，让政府权力归位，才能有效减少资本的异化，维护乡村稳定，使下乡资本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目标。当然，要顺利实现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文以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典型案例为样本，深入探讨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由于休闲养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不涉及粮食安全问题，对农民就业与农民增收，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对这些产业的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社会阻力较小。并且由于政府对第三产业干预较少，资源配置扭曲较小，市场化比较充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资源有效结合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

二、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助力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发展

湖州休闲养老产业的发展既有客观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当地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湖州发展休闲养老产业有客观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社会对休闲养老的需求不断增加。长三角地区老龄化水平高于全国。其中，上海2017年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483.6万，占户籍人口的33.2%，严重超过联合国10%的标准和全国

老龄人口 17.3% 的平均水平。¹ 苏南的无锡、苏州老龄化人口也达到 24%，² 杭州的老龄化人口达到 21.6%，都属于重度老龄化地区。³ 这些地区人均收入比较高，老龄人口规模大，对休闲养老具有较大需求。其次，湖州区位优势，生态优良，是长三角最近的休闲养老目的地。湖州地处长三角腹地，离上述客源地距离都比较近，方便到达。与长三角其他城市高度工业化、环境污染较严重不同，湖州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优良，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发源地，比较适合休闲养老。再次，湖州有发展休闲养老产业的动力。湖州人均耕地少，人均收入高，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靠传统农业肯定不行，而养殖业，设施农业的发展受环境容量限制，也严重受制于生态立市的既定发展路线，休闲养老产业属于高收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因此受到政府鼓励。最后，湖州具有发展休闲养老产业的资源优势。除生态优良外，湖州自古以来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著称，文化底蕴深厚，物产丰富，适合休闲养老。湖州属于吴文化区，对长三角潜在的休闲养老顾客具有文化亲和力。湖州自古教育发达，居民综合素质比较高，思想比较开放，能够很好地服务顾客，把握发展机会。湖州民营经济发达，政府亲商意识、服务意识较强，对政策把握灵活，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湖州所处的长三角，教育发达，资本雄厚，能够为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

尽管湖州具有发展休闲养老产业的客观优势，但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介入湖州休闲养老产业的发展却有一定的偶然性。由于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资源结合方式不同，导致不同休闲养老模式的产生，从当前湖州休闲养老产业看，主要有莫干山镇、顾渚村、横溪坞村三种发展模式，不同发展模式对当地农民收入的提高，分配的改善，乡村治理的影响各不相同，需要认真分析。

莫干山民宿是当前湖州最有名的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曾在 2012 年被《纽约时报》评为全球最值得去的 45 个地方，成为民宿界的网红与行业标杆。莫干山地处沪宁杭金三角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良好，以“竹、泉、云、瀑”著称，号称“清凉世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成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当时一批外国商人与政府要人在这里修建别墅，游泳池和网球场，为莫干山留下两百多栋式样各异，形态美观的别墅以及大量的名人传说、诗文碑刻。20 世纪 80 年代，莫干山曾是红极一时的景区，但很快由盛转衰，山上的别墅也渐渐破败，招待所关门。真正让莫干山民宿重现辉煌的是来自南非的外籍华人高天成，2007 年从上海骑车到莫干山旅游的高天成一眼就看上了青山环抱的三九坞，发现了民宿商机，与几个伙伴租下六间闲置的农房将其改造成低碳型的“裸心乡”，由此一炮是红，深受外国游客喜爱，生意火爆。接下来高天成又于 2009 年投资 1.5 亿元建立了“裸心谷”，将其建成为一个面向外国游客的度假村。同年法国人司徒夫仿照法国乡村民宿在莫干山镇紫岭村建立了“法国山居”，两者一起树立了莫干山高端民宿形象。由于“裸心谷”与“法国山居”良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示范效应，大批外部投资者纷纷跟进，仿照裸心谷建筑风格和管理模式，创建了一大批高端民宿，包括西坡，大乐之野等著名民宿。随着示范效应的增强，《纽约时报》的宣传，莫干山民宿的持续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地资本、本地资本、本地村民纷纷加入民宿业，导致莫干山民宿产业急剧膨胀，到 2017 年已经达到 600 多家。莫干山民宿业的发展直接吸纳当地从业人员 4000 余人，为乡村旅游休闲配套的商店，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间接吸收就业人员超过 10000 人，人均年收入 4.5 万，为当地贡献营收 22.7 亿。^[4] 如果再考虑到高端民宿对当地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当地农民房租、地租的增长，民宿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更大。当前，莫干山民宿业已经不依赖于当地旅游，逐步过渡到无景点休闲模式，高端民宿基本位于莫干山风景区旅游景点以外的西坡，远离喧嚣，以高端消费群体为主要目标。

顾渚村位于长兴县水口乡，以低端农家乐集群为特色，是长三角老年人季节性养老的理想目的地，被称为“上海村”。顾渚村背靠顾渚山，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太湖西岸，由于太湖水汽调节，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宜人，是休闲避暑的好地方。该地自唐代以来就出产皇家贡茶紫笋茶，茶圣陆羽在此撰写了《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至今当地还保存着大唐贡茶院、金沙泉、顾渚山摩岩石刻等古迹。顾渚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茶文化历史，优越的区位，使其成为长三角普通工薪阶层季节性养老的首选地。但顾渚村休闲养老产业的兴起很偶然。1993 年，上海老中医吴瑞安想找一处山清水秀，适合低收入老人的康养之地，走过很多地方后，最终看中顾渚村，然后筹资 30 万创办了老年乐园。由于价格公道，环境优美，康养效果良好，来疗养的老人越来越多，超过老年乐园接待能力，吴医生只能将部分老人介绍到村民家食宿，形成最早的农家乐。^[5] 由于顾渚村生态环境优美，村民服务态度好，服务价格公道，到长三角各地交通方便，相关服务配套设施比较完善，导致越来越多的上海老年人来顾渚村进行短期休假，季节性休闲，长期度假养老。随着顾渚村在休闲养老圈的名气越来越大，苏南、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的老年人也纷至沓来。客源的快速增长刺激市场供给，顾渚村村民纷纷自建农家乐，逐步形成长三角著名的休闲养老产业集群，到 2017 年顾渚村农家乐已增长到 600 多家，顾客遍及长三角各地，每年接待游客 300 多万人次，每家农家乐纯收入 10 多万到 100 万元不等，经济效益明显。

^[6]

横溪坞村位于安吉孝丰镇西北部,距离县城 12 公里,属于江南花园式山区村。村里收入主要依靠竹制品加工,白茶种植加工,黄花梨种植加工三大产业,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份制建立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白茶,竹木生产,形成规模经济,以提高产业利润率,实现共同富裕。^[7]近几年来,由于毛竹价格下跌厉害,竹制品加工竞争激烈,利润下降,白茶由于远离核心区,品牌影响力小,价格提升困难,产业发展遇到瓶颈。在第一、第二产业由于资源、市场约束难以获得更大发展的情况下,横溪坞村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远离市区,横溪坞村无法通过建设厂房,办公楼出租获得租金;由于没有大的景点,横溪坞村也很难像高家堂村,大溪村一样发展乡村旅游业;由于离大景点较远,海拔较低,横溪坞村也难以像石岭村、龙王村、董岭村一样发展季节性休闲旅游业(避暑)。但由于离市区较远,空气清新,竹林与白茶园遍布,离赋石水库较近,村域风景优美,加上海拔较低,交通方便,横溪坞村很适合城市老年人长期康养。在找准自己的发展优势后,横溪坞村决定实行差异化发展,重点发展老年人长期康养产业,但长期康养与季节性养老、短期休闲养老不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管理水平要求也较高,不是个人或村集体可以内部解决,必须引进优质城市生产要素。正是基于此认识,横溪坞村引进外部资本开发了天然居颐养中心项目,建成后有 300 多个房间 500 多个床位,同时引进气候友好农业公司的综合开发项目,在竹林之上建起翠谷竹榭、观景滑索、植物迷宫等,还有一个农事体验项目,占地 300 亩,进一步丰富养老业态。养老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水库垂钓,提高村里门球场、文化大礼堂,金龙山民艺馆的利用率,增加村民就业机会,带动民宿发展和农产品销售。养老产业的引进也为村里增加了每年 120 万的租金,使竹林收益由每亩 200 元提高到 500 元,提高了村民和集体收入。^[8]

从湖州休闲养老产业三个典型案例看,城市生产要素下乡都有效带动了这些乡村的振兴,特别是莫干山精品民宿的发展,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更是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这些乡村的资源就难以得到有效开发,乡村发展就难以达到现有水平。在这三个案例中,莫干山模式对城市下乡资本依赖最大,横溪坞村次之,顾渚村最小。从地方政府的作用看,横溪坞村政府作用最大,通过股份合作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规模经济,以集体力量与资本谈判,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对城市下乡生产要素进行选择、引导,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顾渚村次之,在顾渚村农家乐发展过程中,村政府适时进行了规范,完善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制定了统一的农家乐住宿餐饮卫生标准,保护了生态环境,并配套修建了停车场,特产购物街,组建了汽车队,为顾渚村农家乐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莫干山镇由于涉及面积较广,协调困难,加上城市下乡资本过于强大,地方政府作用有限,除完善基础设施,协助资本下乡落地外,主要靠市场作用。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看,莫干山地区经济发展最好,顾渚村次之,横溪坞村最后,主要受客观的资源禀赋影响。从分配的公平性看,横溪坞村分配最公平,由于内部实行股份合作制,外部也主要以集体方式与资本合作,分配比较均衡。顾渚村次之,那些先知先觉,农家乐占据有利地形,或资本比较多的村民,收益比较高,相反,那些起步晚,缺乏资本,农家乐地形不佳的村民,收益就较低,但村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特别悬殊。莫干山民宿区收入差距最大,法国山居、裸心谷、西坡、大乐之野等知名精品民宿的利润非常可观,每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大部分普通村民缺乏资本,只能依靠出租房子,卖农产品获得收入,利润有限。从可持续性角度看,横溪坞村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由于实行股份合作制,横溪坞村内聚力最强,分配最为公平,社会最和谐,在与外部资本合作中能争取最大利益,随着康养项目的引进,养老业态的丰富,横溪坞村可能会实现休闲养老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顾渚村次之,由于利益分配不太公平,部分村民对农家乐宅基地分配不满,还有部分村民侵占公共资源超标建设农家乐,或暗中恶性价格竞争拉客,影响社会和谐。此外,随着安吉、临安等生态优良地区农家乐,休闲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顾渚村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顾渚村在低端休闲养老市场上的良好口碑也成为双刃剑,形成刻板印象,阻碍了顾渚村农家乐的升级,并且由于农家乐扩张过快,缺乏长远规划,顾渚村已经没有空间用于高端休闲养老产业的发展,面临产业升级瓶颈。莫干山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差,由于很大一部分原住民没有享受到民宿开发的红利,却成为物价上涨、交通拥挤、噪音纷扰、社会治安恶化的受害者,心生不满。分配不公使当地农民盲目扩张民宿,希望分民宿产业的一杯羹,导致无序竞争,降低莫干山民宿品牌声誉。越来越多民宿的建设也导致过度竞争,使供求关系恶化,大量资源闲置。民宿的过度建设也破坏生态环境,使精品民宿的休闲体验降低。如果不采取措施实行公平的再分配,阻止恶性竞争,莫干山民宿热可能难以持续。

三、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

从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发展的经验看,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各级政府应解放思想,积极鼓励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但要充分发挥城市下乡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各地政府应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采取合理措施有效利用城市下乡资本,促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但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头脑里还残存着资本原罪论,资本剥削论的陈旧思想,对资本下乡采取抵制态度,导致当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滞后,乡村凋敝。只有尽快转变思想,认识到城乡生产要素之间的互补、合作、共赢关系,积极引导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才能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动力,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然,由于各地乡村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组织状况差异很大,因此,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资源的结合方式也应多样,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地区城乡生产要素结合模式并不可取。从湖州经验看,莫干山、顾渚村、横溪坞村三大发展模式虽然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当地乡村资源的结合方式、作用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各自契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实现了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当地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都取得了乡村振兴的成功。

其次,应对政府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减少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加强政府监管。由于长期大政府的影响,在引进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过程中,有些政府为政绩需要,对资本进行过量补贴,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低效,损害农民利益。有些政府对下乡资本监管不严,导致部分地区存在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有些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导致资源配置短期化,不利于长期发展。顾渚村虽然为当地农家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交通便利,制定了统一的农家乐经营标准,建设了相应的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丰富了休闲业态。但由于缺乏长远规划,没有为未来的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升级预留场地,导致当地农家乐升级遭遇瓶颈。莫干山民宿发展中政府也没有对民宿发展制定长期规划,导致过度竞争,严重影响莫干山民宿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导致莫干山民宿区业态单一,制约其发展。因此,在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是进行严格监管,引导它们进入合适行业依法经营,并为新产业发展制定长期规划,为它们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支持,至于具体的经营则应该交与市场,以避免资源配置的扭曲。

再次,应正确处理下乡生产要素所有者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比较公平的分配。一般来说,城市下乡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财力、人力、信息资源优势,在与单个村民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容易导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并且,由于投资一般具有负外部性,如污染、噪音、拥挤、物价上涨、挤出效应等,都会对原住民利益造成损害,这些都需要政府进行协调补偿。如果不能合理分配新增利益,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莫干山民宿,早期由于村民对旧居价值缺乏认识,导致租金过低,引发大量纠纷,休闲旅游业发展的负外部性也引起一部分村民不满,影响社会和谐,而对生态保护缺乏补偿机制则导致村民不满,民宿过度开发,最终影响整体环境与民宿品牌价值。只有政府出面,合理协调城市下乡生产要素所有者与村民利益,争取更公平的分配,并对村民的生态保护,负外部性进行补偿,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反,横溪坞村的股份合作模式使村民能够组织起来,与资本进行比较公平的博弈,保证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为产业发展创造和谐的社区环境。顾渚村虽然主要是内部资本,但由于农家乐区位不同经济价值不同,导致不同区位农民收益差异较大,鉴于土地国有性质,必然造成村民对公共资源不公平分配的不满,引发内部矛盾。政府应对黄金地段霸王湖周边土地进行公共开发,以村民普遍入股方式建设中高档休闲养老设施,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顾渚村农家乐档次,满足顾客差异化的需求,增加总体收入,也能够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缓解内部矛盾,还可以增加集体收入,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最后,应努力促进城市下乡生产要素与乡村社区的有机融合,实现乡村善治。对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是下乡资本孤立于乡村之外,成为乡村的孤岛,与村民之间基本没有互动,只存在简单的劳动雇佣关系,有些还与村民关系紧张,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乡村的善治都很不利。另外一个批评是资本过于强势,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将农民整合进生产过程,使乡村完全沦为资本的附庸,丧失独立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造成经常性的劳资冲突,这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乡村的善治。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横山坞村模式的股份合作制,由于村庄的利益与下乡资本的利益一致,双方是合作共赢关系,村民既是企业所有者,也是企业劳动者,企业既是村庄的一部分,村庄也是企业一部分,两者深度融合,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既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有利于乡村善治。因此,对于乡村来说,股份合作制可能是其与下乡生产要素的最优结合方式,这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善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乡村观察,2016,(03):16-26.

[2]王彩霞. 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业规模化生产稳定性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 (11):157-162.

[3]刘玉成,熊红军.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J]. 西部论坛, 2015, (11):1-9.

[4]叶丽丽. 莫干山:曾经一房难求的民宿行业进入洗牌期[J]. 财经天下周刊, 2017, (13):34-45.

[5]孔令君. 浙江长兴“上海村”养老争夺战[N]. 解放日报, 2015-10-14.

[6]王潇,吴越. 去顾渚山村养老的上海人[N]. 解放日报, 2014-07-22.

[7]丁峰. 毛竹“涨价”竹林增效的横溪坞模式[N]. 安吉新闻数字报, 2018-07-27.

[8]欧阳爱琼. 孝丰镇横溪坞村:打造乡村康养目的地[N]. 安吉新闻数字报, 2017-09-30.

注释:

1 上海老龄人口数量与比例资料来源:<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84288>。

2 无锡、苏州老龄化人口比例资料来源:<http://news.focus.cn/suzhou/2015-08-29/10361356.html>。

3 杭州老龄化人口比例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5237803612085&wfr=spider&for=pc>。